

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父亲

于利汉口述 郭成云整理

我的父亲于朝俊,1904年生于沈丘县洪山乡于庄村一个雇农家庭,17岁为生活所迫离家出走,在冯玉祥部队当了兵。

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战败。10月,蒋介石收编该部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931年1月,父亲随部队从山东开赴江西。对红色根据地的第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该路军留江西宁都驻守。“九一八”事变一发生,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遭拒。12月14日,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与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同瑞金苏区取得联系后,趁26路军总指挥离开部队之机举行起义。全军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于第2天开进苏区,改编为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毛泽东曾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宁都起义后,父亲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经受了惨烈悲壮的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32年6月参加了著名的“南雄、水口战役”,亲历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父亲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萧劲光找我父亲谈话,征求他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身边工作的意见,父亲知道这是领导已定了的事情,就愉快地答应了。

我父亲到中央军委总部任了管理员,具体任务是直接负责毛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中央军委主要领导的日常生活。从那以后,与毛主席及其他中央军委领导朝夕相处,亲自感受和亲眼目睹了毛主席的雄才伟略,并和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长征路上毛主席“打摆子”(疟疾),低烧不退,十几天时间里,父亲一直紧跟在毛主席身边悉心照顾。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毛主席一有点空,还教他学文化。在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挥下,父亲参加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这些世人皆知的战役战斗,亲身经历了毛泽东料事如神指挥红军战胜敌人的经过。

父亲随中央领导爬雪山过草地一步步走到陕北。1935年10月,作为先遣人员,我父亲提前一个星期到达延安,修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要入住的窑洞,搭好炕,砌好炉灶,并抽空熟悉周围环境,为首长的日常生活起居,尽力做到安全周到。毛主席率中央



1938年12月,毛泽东(左三)、王稼祥(左二)、萧劲光(左一)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左四起:忽兆麟、郝培谋、张明远、张永励、于朝俊、李十中、张宜斋、蒋耀德、刘型、耿万福、刘向三等。

来到延安后,为了调剂好中央领导的伙食,父亲还带领其他警卫人员一起开荒种菜。

1939年5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5年1月至1945年9月这长达10年的岁月里,在艰难困苦战争环境中,我父亲始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在那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想方设法安排好、尽力改善好中央主要领导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他负责后勤管理,在分发服装时,由于服装数量不充足,父亲首先考虑中央领导和部队其他人员需要,从不考虑自己。一年寒冬,部队被服刚发过,毛主席发现他仍穿件单衣,就亲自批给他一件棉袄,这件事让我父亲很感动,终生铭记毛主席的关怀。

延安开办中央党校,毛主席第一批批准他到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调一批后勤管理干部到东北战场,我父亲被调到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供给管理科科长、第四野战军后勤军需部运输科科长、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管理科科长,全程参与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1956年,我父亲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长期的艰苦劳累,使他积劳成疾,是年组织照顾他离职休养到武汉居住。

我父亲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最令他常忆不忘的是毛主席在他一生中的三次特批:一是亲批上延安军政大学;二是亲批给他一件棉袄;三是1955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工作,还关心着父亲的身体,亲自批准他的工资提高到每月201元。当父亲每月拿到201元时,和他同级别的工资最高的才130元,所以,父亲的高薪对其他同志来说一直是个谜。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我父亲万分悲痛,非去北京见毛主席最后一面不可。当时国家局势非常严峻,对进京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人员严格控制。南方发往北京的火车只能到石家庄,乘客就要被动员转车返回。当车站里劝返的工作人员劝父亲暂不要去北京时,他坚决不答应:把他多年跟随毛主席和毛主席对他的深切关怀反复向工作人员讲说。火车站负责人听后非常感动,最后,经请示做特殊情况特殊解决,车站派出所张所长亲自把他送上去北京的列车并安排车警:要照顾好这位老红军战士。

到北京后,住进了总后勤部招待所,父亲马上与在京首长联系,不知何故,都没有回音。于是,他自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警戒线距会堂很远,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我父亲就向警卫人员表示要最后一次见毛主席,并自我介绍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十年的经历,一再表示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的举动感动了在场的人,警卫把父亲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获得批准,他终于可以再见毛主席最后一面了。父亲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来到吊唁大厅,看到毛主席的遗容,他抑制不住悲恸,号啕大哭,工作人员告诉父亲:这里要肃静,不能哭。父亲抑制了哭声,但抑制不了泪水。他把他对毛主席的仰慕敬重,把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体贴,把与毛主席在艰难困苦时期朝夕相处的十年深厚感情,都融进了他嘶哑的哭诉中和满脸的泪水里。

第二年,父亲检查出肺癌,抗争了七年之后——1984年9月9日病逝于湖北武昌,终年80岁。中央领导及湖北省委主要领导用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我父亲的哀悼。



毛泽东周恩来赞吉鸿昌

邢长顺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一文中说: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然而,还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蔡廷锴……有吉鸿昌、任应岐,有张学良、杨虎城……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

在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选》中,对吉鸿昌、任应岐作了如下注释:吉鸿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沟人,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应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鲁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197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图书出版及博物口儿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张伯驹夫妇与毛泽东的交往

李 郁



6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张伯驹是项城县秣陵镇闫楼村人,成长于官宦之家,为民国四公子之一。民国时期,为收藏文物、保护文物,张伯驹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而且几乎丢掉身家性命。新中国成立了,几十年的战乱结束了,国家安定,人民乐业。他对收藏文物更是痴情,在文物天地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藏。1950年,张伯驹发现有人出售唐代的稀世珍宝——杜牧之(杜牧,字牧之)《赠张好好诗》卷,内心为之狂喜,以5000余元巨资收得,好多天把它放到枕旁,自赏自娱。

他的妻子潘素,擅长绘画,专攻青绿山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片新气象里,绘画迭出新意,创作日臻佳境。周恩来总理评她画的《漓江春晴》“此画颇有新气象。”国家领导还曾以她的画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她与齐白石、何香凝、张大千、胡佩衡等书画名家都有笔墨往来。还与何香凝先生三次参加为抗美援朝现场共同作画义卖。1952年还同陈半丁、胡佩衡、吴镜汀等老画家合作一本画册敬送毛主席,为毛主席祝贺生日。毛主席复函并特派秘书回礼答谢。

潘素与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了《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再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毛主席对文化名人、民主人士一贯尊重,视他们为共产党的朋友。1953年大年初一,毛主席派秘书田家英给知名人士

拜年,往他家送有火腿、糕点、水果、白酒等四色礼品,田家英还代毛泽东主席对他们夫妇问候,并递上一封主席嘱托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代笔信:

张伯驹、潘素先生:

遵主席嘱,在新春佳节之际,送上火腿、糕点、水果、白酒四色礼品,以答谢二位先生对毛泽东之厚意。

祝新春愉快!

致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

一九五三年农历正月初一

信尾押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大红方印。

张伯驹和田家英有短暂的面叙,称田家英是一位博学儒雅的人,对古人书画有很高的悟性和独特的见解。

张伯驹夫妇对一代伟人毛泽东十分崇敬,对新春佳节毛主席四色礼品相送,张伯驹夫妇更是没齿不忘,当时竟没想起要向主席回赠什么,夫妇事后很是悔憾。

1956年,张伯驹想把珍藏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送给毛主席,但他知道主席日理万机,是不能随时随便上门拜访的,于是,便写了一封信:“毛主席: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然后将信和宝帖一起交给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让他代呈。

《上阳台帖》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是李白唯一传世书法真迹,草书5行25字,款署“太白”二字。上题乾隆楷书“青莲逸翰”,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全帖收藏印章琳琅满目,达63方之多,实乃旷世绝品。此帖在民国时期,被溥仪带出故宫后流落民间。为保国宝不流出境外,1937年,张伯驹以6万银元将此帖收藏于家中并秘不示人。李白墨迹笔意高古,墨色笔法非后人所能拟。毛主席接到后,又亲嘱中央办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公厅代他写信相谢。

毛泽东诗风与李白相近,更是喜好书法,对此帖十分珍爱。后来毛主席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称《上阳台帖》“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嘱中央办公厅,将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至今。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张伯驹饱含深情地写出挽联:覆地翻天,纪元重开新史;空前绝后,人物且看今朝。



二十岁那年我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

张秀荣

1933年,我出生在荥阳县一个贫穷的农家,1952年初,我和另外8个男青年一起来到黄泛区农场学习拖拉机、“康拜音”(收割机)驾驶技术。通过个把月的实际操作学习,就成了一名正式拖拉机手。

麦收时,我驾驶着康拜音收麦,麦收后,开着拖拉机犁耙地,工作又脏又累,还要受热忍渴,有时走着路都能睡着。那时也没有星期天,大家都比干劲,比贡献。因为大家都有坚定的信念——用我们的劳动建设我们的国家。

1952年麦收后,我作为黄泛区农场的代表参加了许昌地区召开的妇女代表会。11月,去开封参加了全省的妇女代表大会。也就是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我被评为场劳动模范。

1953年4月,领导通知我去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5日,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致开幕词,邓颖超作报告。大会开了9天,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先后有周总理、邓颖超、康克清等。令我难忘而又可笑的是当要做报告的周总理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一瞬间,一旁的康克清伸手把总理要坐的凳子拉了,总理坐空差点蹲在地上——很快明白过来的总理止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一下,全场都大笑了。康克清、邓颖超也在大笑,全场还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一天,朱老总来参加会议,他握着我的手问我是哪里人,做





什么工作。我说我是河南人，在农场里开拖拉机。他笑着说：“女驾驶员，年纪这么小，不简单啊！”开会时朱老总坐在我的前排，他两次回过头来微笑着看我，这使我意识到也许在代表里我年纪太小，也许是我的男式衣着打扮“与众不同”，也许是我那不多见的“超短发”引起了朱老总对我的注意。



19日，负责会议工作的领导宣布了几条纪律，特别强调到照相时按定好的位置站，不许移动。还有一点和平时不同，那就是明显可以看出保卫人员增多了，我心里都已感到可能是毛主席要来了。我们按工作人员指定位置排队，老一辈革命家和职务高的站在前排。大家刚就好位，毛主席来到了怀仁堂。他老人家魁梧高大，和蔼而亲切，向我们频频挥手致意，所有的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一个劲儿的鼓掌，秩序井然，没有一个人朝前挤。前排的申纪兰竟跨步上前一下子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等簇拥着毛主席在中间坐好，我就站在他老人家的身后，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照了相毛主席就走了，没发表讲话。

60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在那次大会上见到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合影时，我的心里就感到温暖、幸福。

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刻

邱友功

1956年5月,我通过考试,被中央农业干部学校录取,当月报到,学期为一年。

1957年6月19日下午,在颁发结业证书时,班主任通知,要求每个学员做好准备,20日早8时准时到达中南海,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我听到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后,异常激动兴奋,打开衣箱,找出最干净的衣、鞋、袜备穿,拿起刮脸刀修面整容。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一点睡意。我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自17岁入党,参加革命工作,时时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多年梦寐以求地想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愿望,明天就要成为现实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准备好,不能误时、失礼、失态,要毕恭毕敬地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天不明我起床穿好衣服,梳洗打扮一番,等候集合哨响。

早7点,全校学员就集中在操场等车,7时半到达中南海怀仁堂后院停车场,8时学校领导和会场工作人员安排我校468名学员坐到指定位置。

9时许,毛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陈云主任等七位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会场。这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响个不停,有个别同学高呼毛主席万岁(那时规定不叫呼口号),掌声持续五分钟之久。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分左右绕场一周招手致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中场,一边走一边鼓掌。中央领导人座照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相后,毛主席、朱委员长又分左右绕场一周,招手致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是走中场鼓掌致意,全场又沸腾起来……同学们一直目送中央领导离开。在这时刻,我激动得两眼流淌出幸福的热泪,久久沉浸在这一难忘时刻,直到老师叫我跟同学们出场登车回校才缓过神来。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笑声、歌声不断,兴奋、激动、感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回到学校后,班主任就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谈感受、说想法。我第一个发了言:“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受苦,勉强上学三年,读私塾一年半,后因家贫,加上日本鬼子侵占我家乡,就被迫辍学了。求学是我一生的追求,这次组织上让我来学习,我是求之不得。又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我做梦也没想到,使我终生难忘。回到工作岗位上后,我要把学到的知识用于工作实践,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中央领导以及学校领导、老师的培养教育和关怀。”



每当想起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心里就荡漾起一股幸福的暖流,他老人家那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举手致意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它将伴随着我度过幸福的一生。

我三次见到毛主席

张秀成口述 李树恩 朱红霞整理

我叫张秀成,1925年7月出生在商水县邓城镇白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我的四叔张金明及我婆家的大伯赵其昌为地下党员,他们还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我则成了一名忠诚可靠的地下交通员,那时我就接受了党的教育,时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传递情报。1947年2月,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走过的路、经过的事,最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就是三次进京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张秀成同志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会议时留影

解放后,在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推举下,我担任了杨湾高级农业社社长。

杨湾高级农业社有5500亩土地,全在沙河堤下,因历史上沙河多次在这里决口,有2500多亩土地被淤沙覆盖了,还有近千亩严重沙化。地面高低不平,漏水漏肥,不成庄稼。为改变这一现状,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我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在两年时间内,在沙化土地上,把熟土挖出,把黄沙埋下,又通过平整土地,把全社 5500 亩土地,改造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旱涝保收田。同时推广优良品种,改善施肥技术。1956 年,俺社里种的棉花,产量全县第一;夏粮单产突破了 500 斤(全县平均不足 200 斤),不但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粮食定购任务,还支援周边农业社完成了粮食定购任务。县委书记刘裕民命人为我塑像,以示对我的表彰和鼓励。

1957 年,我被评选为商水县特等农业劳动模范,奖给俺社一匹大红马。同年又被评为许昌地区特等农业劳动模范和河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1 月我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召开,院落很大,周围有很多房子,各省有各省的住室。许多著名的英模人物,如王进喜、时传祥、陈永贵、刘胡兰的继母、苏殿选、文香兰、郭巧、常香玉、申凤梅等参加了会议。我记忆当中苏殿选年龄较大,他和蔼可亲,我跟他走在一起说话或聊天,大家戏说像是父女俩。鲁山县文香兰是一个很俊俏的姑娘,我们俩的年龄不相上下,说起话来很合得来。

会议的第一天,首先听取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号召与会农业劳模要发扬大无畏的精神,与天斗,与地斗,努力提高粮食产量。接下来就是讨论、领会周总理的报告精神。

会议开了大约一周。会议结束前天的早饭后,省里带队的通知上午有重要活动,不要随便外出。去参加活动时,不要随身携带火柴、香烟、小刀、钢笔等小东西。具体是什么活动没有讲。与会劳模们按照省里领导人的吩咐,坐上了大轿车,开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在服务人员的指挥下,面朝南站成五排半圆形的队列,第一排的正中间还放了十多把椅子。我看这种阵势,想该不会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吧?谁也不明讲,毕竟是猜测,单等这一真实时刻的到



来!

等了一会儿,毛主席在前,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邓子恢紧随其后,从西南角步入怀仁堂,进入接见现场。我一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全身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其他与会的劳模们也都不约而同地高声呼喊起来。我的眼里顿时涌出幸福的泪水。我的个子较矮,又是站在第四排,双脚不由自主地想往前挪,一睹领袖们的风采。要不是事前宣布的有纪律,我一定冲上去与毛主席及他的战友们都要握一下手。可是,我只有强压住内心的冲动,用“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表达我对领袖们的爱戴和内心情感。毛主席边走边挥手,并大声说:“同志们好!劳模们好!”这时候,整个接见现场都沸腾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绕场一周后,坐下与大家合影。直到摄影师调正好相机将要拍照时,大家才算安静下来。

我这个旧社会里的要饭花子,居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使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几天平静不下来。我暗暗下定决心,还要像以往那样,拼死拼活也要把工作做好。

1958年,我与当时任固墙公社党委书记的段秉坤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大会”,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在北京度过了1959年的元旦佳节。

1959年10月1日,我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庆祝国庆十周年观礼,在天安门右侧观礼台上,再次近距离看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三次到北京,三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使我一生都感到幸福的事情。



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杜恒荣

阎汝山

杜恒荣是淮阳县朱集乡杜楼村人。1948年参加工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支前活动;1949年被推选为农会会长;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1954年,和杜有忠一起创办了淮阳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淮锋社,成为淮阳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当年被评为河南省先进工作者。

1958年,他被评为河南省农业先进工作者,同年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还荣幸地领到了一块由国务院颁发、周恩来亲自署名的奖匾,上书“奖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单位”。

后来,杜恒荣先后任淮阳县朱集中心乡乡长、公社社长、党委书记,中共淮阳县委委员、常委,中共周口地委委员,淮阳县农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淮阳县能源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淮阳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1965年,他在任鲁台公社社长期间,为改变落后面貌,在鲁集大队驻队蹲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深耕土地,引进良种,使鲁集粮食产量连年增产,成为全县乃至全省发展农业生产的典范。1971年鲁集农业生产成果参加了水电部在北京举办的治淮成就展览。河南日报、河南电台做了长篇报道,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纪录片,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来鲁集参观学习。

1968年,中共周口地委、中共河南省委先后做出决定,号召



全区、全省干部群众学习杜恒荣同志的模范事迹。1970年10月，杜恒荣参加了国庆观礼，在纪实电影中，杜恒荣的镜头出现在观礼台上的显要位置。他回来后讲：在观礼台上，当毛主席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真想去拉毛主席，只要一伸手，就可办到。因为接见前有关领导讲过纪律，首长到你面前，不能随便伸手。他当时激动得简直不知怎么好了。毛主席从我身边微笑着走过，近在咫尺，多么幸福，多么荣幸啊！作为一个旧社会受苦的农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1973年8月，杜恒荣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荣幸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是他一生中有幸第二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十大召开期间，敬爱的邓颖超大姐作为河南省代表，参加河南小组讨论。杜恒荣等河南代表与邓大姐一起开会，一起讨论，一起学习，畅所欲言，亲切感人，一起度过了一段最美好、幸福的时光。

杜恒荣于1993年1月去世，享年66岁。



父亲陪同毛主席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

王晓玲 董建州

父亲王文生 1943 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调新乡县七里营农庄任主席,改称七里营公社后任社长。当时,七里营创办了炼钢、榨油、造纸、食品加工等 100 个工厂和养猪、养羊、养蜂、养鱼等 93 个养殖场。使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农庄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庄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农庄”这个名字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已不再适合,经过数次召开群众大会酝酿讨论,先后定名“红旗联社”、“共产主义公社”、“人



18

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周口



毛主席视察七里营,右一是王文生



民公社”。最后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定名为“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1958年8月4日早晨,父亲挂出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我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名称由此诞生。

8月6日——人民公社正式命名的第三天,毛主席到七里营视察。

那天下午,雨过天晴。七里营人民胜利渠上出现了几辆引人注目的小汽车,这些小汽车驶下大堤,折向渠旁的七里营。驶在最前边的一辆浅蓝色的小轿车在七里营人民公社的门口停下,下来一位身材魁梧、面带笑容,全国人民都熟悉的老人。

“啊,是毛主席!”站在门口的人说了一声,快步向毛主席走去,院内的人听说毛主席来了,也拥向门口,“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大家鼓掌欢呼,有的人抢上去和毛主席握手……

当人们聚拢在公社门口的时候,毛主席在县委书记胡少年和父亲的陪同下向公社院走去,在进门的时候,毛主席看到了门口挂的牌子——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县委书记随即向毛主席说:这是全县第一个公社。毛主席点了点头,含笑说:“这名字好啊!”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当毛主席从谈话中知道七里营人民公社是个 6100 户、31000 人的大社的时候,就十分关切地道:“社这么大,管理不容易啊,有没有困难?”

“没有困难!”父亲回答。

毛主席不肯休息,要去看公社的幸福院、托儿院、食堂、社办工厂和棉田。毛主席从公社院里走出来,聚拢在门口的群众,向敬爱的领袖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

从公社院里出来,拐了两个弯,就来到公社的幸福院。这是一所高大宽敞的院落,全村孤寡老人和孤儿,还有一些残疾的人,都住在这里。

毛主席一面向老人问好,一面关切地问父亲:“老人们在这里满意吗?”当听到社长说“他们很满意”的时候,毛主席高兴地笑了。

毛主席又去看农民食堂。食堂收拾得整齐干净,炊事员正在



毛主席视察七里营棉田,右一是王文生。

向笼里装馍。父亲告诉毛主席：“我们一天三顿都吃馍。”

“菜呢？”毛主席关切地问。

“每顿都有熟菜吃。”父亲回答说。

毛主席表示满意。

毛主席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人民的生活。大家又是感激，又是兴奋。

在路过一座独木板搭的临时小桥时，毛主席迈着稳健轻快的步子快速走过，越过茂密的豆地，跨过了满布瓜蔓的菜田，来到了一望无际的棉田。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这块棉田施多少肥，以及耕作情况。父亲告诉毛主席：这块棉田共300亩，施足了底肥，土地深翻1尺5寸。毛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兴致勃勃地拨开枝叶茁壮、棉桃成串的棉枝笑着说：“怎么走进去呀！”毛主席走进齐肩深的棉田，笑容满面地向在场的人们环顾了一下，特地用手平着棉顶比了一下肩膀，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在返回村子的路上，毛主席面对着一片丰收景象满意地对吴芝圃同志说：“吴书记，大有希望！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同志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毛主席表示赞同。

1965年7月，父亲调到周口地区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精神和身体遭受严重摧残。在五七干校期间，他当过饲养员、炊事员、事务长。

1979年元月，周口地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并调任周口地区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1981年7月14日，父亲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终年65岁。



毛主席收藏的何仰羲的书法作品

张继华

由叶剑英委员长题写书名、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在鼎鼎大名的齐白石、张大千、陈半丁和郭沫若等书画大师之后，赫然有“何仰羲”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

何仰羲，字砚农，别署柳湖钓叟。他自幼聪慧，7岁始从师学书，名碑法帖无不心摹手追。在墨池砚田中默默耕耘数十寒暑，由一笔不苟的摹临到自出机杼的意造，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行草书，直取二王之法，参以怀素、郑燮笔意，运笔圆劲苍秀，结体错落有致，分行顾盼神合，被人称为“陈州秀笔”。

1957年国庆节前夕，何先生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景仰之情，书就了七言律诗《长征》四条屏，寄到北京中南海。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主席见笔力劲健，气势磅礴，甚是喜爱。从此，这件墨宝一直珍藏在毛泽东故居，后来被选



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毛主席收到何先生的墨宝后不久,何仰羲就被打成了“右派”,连毛泽东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他的致谢函也未见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何先生赋闲农村老家,仍精研书法艺术不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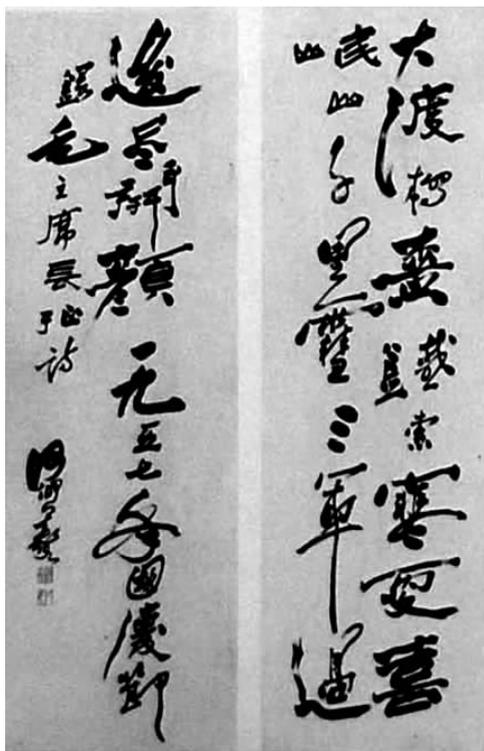
粉碎“四人帮”后,何先生身兼河南省政协委员、周口地区书协主席等职,又被河南省政府聘为文史馆员。在毛泽东主席诞辰 100 周年

之际,《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上的书画大师大部已作古,何先生当时还健在。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韶山毛泽东同志



纪念馆向他求书,他都一一应允。中央办公厅、纪念堂的负责同志还千里迢迢来淮阳给他送来“收藏证书”、“荣誉证书”及奖品等。

这是一介布衣与伟人之间的一段翰墨之缘。



毛主席特邀施德生到家里做客

许桂云

1958年6月,召开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邀了几位与会人员到家作客,其中有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施德生。



24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50年代中期,豫北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施德生就以封丘县应举社为点解决生产自救,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应举社渡过了难关,创造出了好经验,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赞扬。1958年3月,一篇反映应举社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报告经新乡地委转给党中央,毛主席在广州看到这个报告十分兴奋,4月15日,写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并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毛主席指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现在向全国七十七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14日下午6点钟左右,在北京参加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施德生和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封丘县县长张剑南、应举

社代表崔希彦一起,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家里。

毛主席关切地问了应举社的情况之后,就和熊天荆、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20多种内容一一讲给毛主席听。

毛主席说:“这么多,能做完吗?”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他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施德生回答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熊天荆说。

“你的意见呢?”毛主席问熊天荆。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毛主席乐得笑开了。

在谈话的过程中,毛主席一直拿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大家的话都记下来。

毛主席称赞说:“河南省今年夏收作物总产量200多亿斤,比去年增产一倍多,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毛主席慈祥的脸上呈现出愉快的笑容。

“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生产大跃进取得的成绩。”施德生、张剑南和崔希彦三人异口同声地说。

然而,毛主席却是那样地虚怀若谷,他连声说:“不,不,从全国来说,是6亿人民的力量,从一个合作社来说,是全体社员大干苦战取得的。”

毛主席又向在座的人描绘了一幅幸福的生活远景: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其中人吃600斤,其他留作储备粮、种子和喂猪)、100斤猪肉、20斤油、20斤棉花。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 1500 斤粮食。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了。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这时,有一位同志走进来,对毛主席说:“吃饭了!”

一听说吃饭了,四人就站起来准备告辞。

毛主席连忙说:“别走啊!就是请你们一起来吃晚饭的!”

大家一听毛主席要请吃饭,就乐开了,真是高兴上更加高兴。

毛主席领着大家一起走进了一个小餐厅。这时,饭菜已经在桌上放好了。

在餐厅里有四个人在那等候着,毛主席向客人们一一做了介绍。

毛主席指着两个年轻的姑娘说:“这是我的女儿,她们都在读书。”

又指着那个青年说:“这是我的侄子,是我弟弟毛泽民的孩子,我们弟兄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害了!”最后介绍到那位女同志,毛主席笑着说:“她是我的爱人江青。”

接着,毛主席又把客人一一做了介绍。介绍崔希彦的时候,毛主席特别高兴地说:“他就是我在‘红旗’杂志上介绍的那个合作社——应举社的社长崔希彦同志。”

毛主席亲自夹各种菜让客人吃,客人们难免有受宠若惊之感,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的亲切温和,很快消除了拘谨和不安。毛主席面前有一小碟绿莹莹的菜,毛主席看到崔希彦好奇的眼光,就解释说:“这个菜叫苦瓜,我老家湖南常吃的,你们俩是北方人,是吃不惯的。不信,你们可以尝尝。”听了主席的话,施德生、崔希彦两人小心翼翼地夹了一点点放在嘴里,结果苦得想吐也不敢吐,没吐出来,苦得不想咽又强咽了下去。看着两人的样子,毛主席和江青都笑了。

饭桌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施德生是哪里人,当他告诉主席自



己的家乡是扶沟县时,毛主席饶有兴趣地问他:“哦,扶沟,为什么叫扶沟啊,有什么来历吗?”他没有回答上来,失去了一个让伟大领袖了解自己家乡难得的大好机会,使他十分懊悔。

吃了饭以后,毛主席又叫人拿出了一盘苹果请客人吃。可是谁也没有吃。崔希彦很想拿一个苹果带回应举社作纪念,但是又不好意思这样做。

毛主席好像看透了这位农民的心思,他笑笑说:“不吃,带走也可以!”

崔希彦高兴极了,拿了一个大苹果装到袋子里。施德生、张剑南等人也分别拿了一个苹果作纪念。

两个多小时后,施德生他们起身告辞,毛主席一家人都出来为客人送行,送了很远,毛主席还不肯回去。施德生说:“毛主席不回,我们也不走了!”他们这才停下脚步,目送他们远去。

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幸福的会见 巨大的鼓舞》为题,报道了毛主席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农业社社长崔希彦等人的情景。

施德生从北京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查阅《扶沟县志》,他希望能再次见到毛主席时说清楚扶沟县名的来历,可是直到毛主席逝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周口戏剧

王中民

我在周口工作四十余年,做过专职编剧,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多是与戏曲和剧团打交道。

周口是戏曲大市:剧种多,剧团多,名戏多,名演员多。作为戏曲之乡,在全省全国都享有盛誉。“文革”结束以来的连续五届中共全国党代会,河南省戏曲界都只有一个代表,而周口戏曲届的代表参加了四届:十三大、十四大申凤梅,十五大党玉倩,十七大、十八大申小梅。由此可见周口戏曲在全省的地位。周口戏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一、毛主席一句问话 成就了《诸葛亮吊孝》

1958年12月,毛主席来河南视察工作,并召开了有名的郑州会议。其间,毛主席观看了越调《收姜维》,陪同观看的还有刘少奇、朱德等出席郑州会议的领导。

《收姜维》是1956年河南省戏剧汇演的获奖剧目。此次演出,由申凤梅饰演诸葛亮,大宝贝(张秀卿)饰演天水关太守马遵。张秀卿长申凤梅10岁,善演须生,被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称赞为河南的马连良,更被申凤梅尊为河南越调的奠基人。这次在《收姜维》中虽只演了个配角,却把马遵压制人才、忌贤妒能、气量狭小、无所作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演出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对陪他看戏的河南领导说:“演马遵的是个好演员。”

毛主席很喜欢《收姜维》,尤其喜欢其中诸葛亮这个人物。演



出结束后,中央领导上台接见演员时,毛主席问申凤梅会不会演《卧龙吊孝》,申凤梅诚实地回答说:“不会。”毛主席不无遗憾地“啊”了一声,就不再往下问了。

毛主席的这句问话对剧团领导和申凤梅震动和启发都很大。受毛主席问话的启发,剧团决心挖掘和整理《卧龙吊孝》,并派导演闵彬到南阳一带遍访当地老艺人。但被访者都说越调没有《卧龙吊孝》这个戏。后来笔录了一位老艺人口述的《芦花荡》和《柴桑口》两出折子戏。根据这两出折子戏,又参考了《三国演义》的有关章节,终于整理出了《诸葛亮吊孝》。正当《诸葛亮吊孝》创作排演的关键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戏一搁就是十几年。

新时期开始,周口地区越调剧团对《诸葛亮吊孝》继续进行加工整理。1979年春天,接省文化厅通知,要求剧团6月份到郑州参加全省戏曲汇演,该团确定就拿《诸葛亮吊孝》参演。但就当时的剧本和演出看,该剧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由杨岩石、闵彬、我和周广立、冯波对原剧本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修改意见。

至5月底,修改和排演工作全部告罄。6月赴郑州汇演,一炮打响,好评如潮。中央看戏小组的组长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叶枫在座谈会上称申凤梅宝刀不老,演小乔的陈静光彩照人,演周瑜的何全志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整台演出,阵容整齐,是一出十分成功的好戏。

与此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携著名导演谢添到郑州专程看《诸葛亮吊孝》,看后立即拍板让该戏到北京去拍电影,并于这年冬天完成了拍摄任务。

申凤梅同志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那句问话,剧团就不会想起去整理《诸葛亮吊孝》这出戏;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那句问话,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去搞这出戏。十年磨一戏,《诸葛亮吊孝》从确定题材到拍电影,前后经历了21年……”申凤梅还说:“如果没有《诸葛亮吊孝》,仅有一个《收姜维》恐怕我这个“活



诸葛”的份量就轻得多。”

二、董必武爱看“李天保” 周恩来盛赞“诸葛亮”

1963年3月19日,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杜近芳推荐,应北京市文化局的邀请,申凤梅所在的越调剧团(时为商丘地区越调剧团)首次到北京演出,所带剧目当然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收姜维》《李天保吊孝》。

3月21日,由文化部艺术局、全国剧协、北京市文化局联合会主持,越调剧团在首都吉祥剧院举行了首场演出。首演剧目为《李天保吊孝》,申凤梅饰李天保,何全志饰老鳖一,李金英饰假妯己。前来观看演出的除田汉、老舍、张庚、崔嵬、赵树理、袁世海等全国知名文学家艺术家之外,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来观看。这场演出非常成功,从头至尾掌声不断,笑声不断,董老笑得前仰后合,不时带头鼓掌。演出结束后,董副主席高兴地上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并连连夸赞“这个戏好、演得好,很有看头儿,也很有意思……”接着田汉、老舍等也热情地走上台来献上了花篮及贺联贺幛。田汉同志说:“《李天保吊孝》这个戏,不仅演得好,戏本身也很有意义,很有艺术价值。这个戏就是放在莎士比亚喜剧里面也不逊色,戏里的老鳖一并不亚于莫里哀笔下的怪吝鬼……”

3月24日,在吉祥剧院又演出了《收姜维》,前来观看演出的不但有首都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而且有的是演诸葛亮的,有的是写诸葛亮的,被誉为京戏活诸葛的马连良和夫人陈慧瑛及高徒冯至孝、李和曾、马长礼也在观众席中。这场演出不仅是对申凤梅、对越调剧团、甚至对整个越调剧种来说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演出非常成功,可以说这一成功确立了越调剧团,确立了申凤梅乃至越调剧种在全国的地位。剧团整齐的阵容,严谨的台风,尤其申凤梅饰演的诸葛亮征服了全场观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戏剧报》都报道了该场演出的盛况,刊载了演出剧组。袁世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达3000多字的评论文





周总理接见申凤梅

章——《漫话越调收姜维》。

过了两星期，剧院负责人突然给剧团领导说：“这回你们可在北京弄出大动作来啦，今晚周总理要来看你们的《收姜维》……”听说周总理来看戏，可忙坏了剧团上下，连马先生也老早赶到剧场，为演员说戏，

为剧团鼓劲，亲自为申凤梅化妆，并把自己心爱的羽毛扇和八卦衣送给了申凤梅，但是因为总理临时有接见外宾的任务，没有能来看这场演出。

一直到4月19日，周总理才有时间看我们的戏。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给周总理演《收姜维》。和周总理一同来看戏的还有彭真、薄一波、谭震林、包尔汉、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场戏周总理看得非常高兴，并不断带头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和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侧门走上舞台，先和吕国英等乐队同志握了手，然后又和全团演职员一一握手。周总理十分赞赏申凤梅饰演的诸葛亮，他握着申凤梅的手亲切地问：“你演了多少年戏啦？”申凤梅激动地回答：“20多年啦！”总理风趣地说：“河南省诸葛亮好，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接着总理又说：“越调这个剧种我知道，你们信阳不是也有个越调剧团吗？”申凤梅忙回答：“有，有……”接着周总理又问饰演赵云的张秀兰：“你演几年戏啦？”张秀兰因为太激动，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我演的时间可长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啦……”逗得大家和总理都笑了。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走后，张秀兰的丈夫对她发了火：“你这个人，太不会说话，你不对总理说清楚演了几年戏，反倒说演的时间“可长了”，卖啥老资格，你才演几年戏呀！”张秀兰委屈地说：“见总理，只顾高兴，总理一问，我把话咋说都忘啦，还会卖老资格……”

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周总理建议在休息室里开个临时舞会，并邀请申凤梅和大家一起跳舞。因为越调团的演员都不会跳舞，总理笑了笑说：“那就算啦！”同时安排随行的同志说：“地方剧团演员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一定要让大家吃好、玩好、休息好。”第二天，在总理的关怀下，剧团全体演职员乘坐国务院安排的三辆大轿车游览了长城，至今剧团的老同志谈及此事仍激动不已，说坐着大轿车，沿着长安街，一路警车开道，行人注目，出德胜门，直到八达岭，风光得像外国使团一样。

周总理观看《收姜维》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报纸都刊载了周总理观看该剧的消息和接见演员的大幅照片。不少著名艺术家、评论家也纷纷发表文章，盛赞越调剧团。田汉同志在家里接见了主演申凤梅和剧团指导员杨岩石。

4月29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又观看了《李天保吊孝》，陪同总理观看演出的有董必武、李先念、彭真、罗瑞卿、邓颖超等领导。董老非常喜



彭真副委员长接见申凤梅



欢《李天保吊孝》这个戏,此前他已看过三次,觉得没看够,又来看第四次。尽管如此,董老看着台上的演出仍高兴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周总理对《李天保吊孝》这出戏也十分欣赏,看了这个戏的第二天,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说:“我们都是穷朋友,中国人民不嫌贫爱富,最近河南有台戏叫《李天保吊孝》正在北京演出,这台戏就是批判嫌贫爱富的……”

5月1日,剧团部分演职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五一”游园活动。陈静、江泳等青年演员演出了小戏《掩护》,朱德委员长等领导与前来参加游园活动的外国来宾观看了演出。

三、《扒瓜园》进京拍电影 毛主席接见申凤梅

1965年5月,越调剧团排演的小戏《扒瓜园》,代表河南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南地区现代戏汇演。《扒瓜园》在广州演出十分成功,汇演没有结束便确定送到北京去拍电影。同时到北京电影的还有参加中南汇演的曲剧《游乡》及湖南花鼓戏《补锅》《打铜锣》。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同志非常重视这次汇演,他不仅一场不缺地看完了全部汇演剧目,还给每个剧目提修改意见。为了让演职人员能更好的演戏,他查看了伙食后说:“他们白天观摩,晚上演出,太辛苦了,一定要让大家吃好。”汇演的中后期,演员的伙食费由原来的每天每人四元高到六元。

《扒瓜园》在北京拍电影期间,陶铸同志还亲自去探望。

拍摄刚结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告诉《扒瓜园》剧组到人民大会堂,说是有领导接见。10月10日上午,大家在人民大会堂集合等候,同时等候接见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牧骑。

十一时许,靠近门的同志突然鼓起掌来,站得离门口较远的申凤梅、何全志、刘琳及琴师吕国英等也随之鼓起掌来。大家这时才看见从门外走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微笑着频频向大家招手,紧跟在毛主席后面的还有周总理、



林彪、彭真、陶铸等领导。

这次接见,时间很短,毛主席没有讲话,也没有停留,但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毕竟是亲眼看到了毛主席,而且距离又那么近,又是在向自己招手和点头。这使每个被接见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申凤梅、何全志、吕国英是继1958年郑州汇报演出之后再次见到伟大领袖,自然倍感亲切;青年演员刘琳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更是激动万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离开之后,她两只手抱着申凤梅的胳膊半天没有松开。

四、钱昌照观看《西湖公主》 黄文欢惊叹令人神往

1986年7月,周口地区豫剧团带着新编大型神话戏《西湖公主》去北京演出,受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的亲切接见。国际友人,越南前总理黄文欢不仅连看两场,且欣然命笔为《西湖公主》题写条幅。

《西湖公主》于1985年10月完成排练搬上舞台,同时参加河南省首届戏剧大赛,获剧本、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灯光等11项大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演出了200多场,颇受观众欢迎。

7月11日,《西湖公主》在首都工人文化宫举行了首场演出。但北京的一些演出管理部门和接待我们的剧场并不看好,他们说:“哎呀,你们怎么这时候来北京呀,现在天气正热,中直单位和中央的大部分领导都到青岛或北戴河避暑去啦,你们恐怕连人也请不到。”

但是,7月11日的首场演出,效果出人意料的好。《巫山寻妻》一场,长达二十多分钟的唱段,饰演陈光明的江团团结于跋山涉水的动作中兼做兼唱,“左右甩发”、“飞跪转身”、“硬僵尸”干脆利落、“跪措步”又靓又帅。饰演阿珊的宋晓波青春靓丽,扮相俊美,音质纯净,音域宽广,高亢处清扬激越,响过行云,低婉处细如游丝,欲断非断。《神水救夫》一场,一句跪唱一连两个满堂好,最后一句拖腔,动人心魄,扣人心弦。《水斗》一场,饰演珠妹的李香身



手敏捷,流星锤耍得风雨不透,一个动作——抬脚踢出六条飞枪。饰演龙母的肖秀莲一句内唱导板,声震全场,接着率领众仙驾云御风,凌空飞动。场内的掌声和喝彩声竟达47次之多。演出结束,许多观众拥向台前,挤上舞台,争相与演员合影留念。

首场演出后,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评价和报道《西湖公主》的演出盛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看豫剧〈西湖公主〉》。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导看完演出后,也先后跑到剧团联系拍摄电影艺术片事宜。

之后,演出状况大为改观。7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文化部部长王蒙、国际友人黄文欢都前来观看《西湖公主》。这场演出,演员情绪稳定了,表演放开了,效果比首场演出还要好。钱昌照等领导看得十分高兴,演出结束,他们走上舞台,热情地接见演员并与之合影留念。送走钱昌照等领导后,王蒙同志以部长兼学者的身份在后台给全体演职员讲了话。他说:“《西湖公主》这个戏很好,剧本编得好,演员演得好,整个舞台如诗如画、美视美听、允文允武、充满生机,是一出充满青春气息的好戏。”他还说:“我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感冒了,本来打算看个头就走,可结果一看,就把身体不舒服忘了,不想走了,一直看完,这就是好戏的力量……”

此后,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导演范梅强为《西湖公主》进行了全场录相,并在中央台戏曲栏目多次播放。

五、乔石、李德生等中央领导观看《吵闹亲家》《诸葛亮吊孝》

1991年10月20日,河南省越调剧团带着他们新创作的大型现代喜剧《吵闹亲家》和传统戏《诸葛亮吊孝》进京演出,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德生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的亲切接见。

我是喜剧《吵闹亲家》的编剧,创作于1990年上半年。导演是张建军,陈静饰演张二翠,何全志饰杨大山,申凤梅甘当配角饰演



其中的杨奶奶。编剧当年的10月,该剧参加河南省第三届戏剧大赛,获导演、表演、剧本创作多项大奖。1991年10月应文化部和民政部之邀进北京演出。

10月21日,《吵闹亲家》在首都吉祥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场内爆满,座无虚席,观众情绪热烈,掌声笑声不断,全场鼓掌达40多次。演出结束后,演员多次谢幕,观众仍久久不愿离去。

25日和30日剧团两进中南海,分别为中央领导演出了《吵闹亲家》《诸葛亮吊孝》。期间中常委乔石、中顾委副主任李德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部长助理高运甲等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工。接见时,迟浩田紧紧握住申凤梅的手说:“好,这个戏很好,也很有教育意义,建议你们到解放军三总部也演一下,让他们也看一看。”高运甲说:“非常精彩,从头到尾,每个动作,每句台词都是戏。”由于迟浩田总参谋长的推荐,剧团又到三总部演出了多场。

1991年11月,文化部将《吵闹亲家》定为全国优秀剧目向中央电视台推荐,于1992年春节向全国广大观众播出。

六、申小梅为江总书记唱戏

申小梅,原名赵玉霞,1990年正式拜申凤梅为师,次年调入省越调剧团,是申凤梅的关门弟子,正宗传人。在申凤梅逝世后,为继承和光大申派艺术,易名申小梅,扛起了越调大旗。她在《申凤梅》一剧中饰演申凤梅,演出非常成功。她演的申凤梅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这个戏1998年参加河南省第七届戏剧大赛,申小梅获表演一等奖。

1999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到河南视察,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明义负责总书记的保卫工作,和总书记同车一路从北京开往郑州。途中,王明义说闲话似的给总书记汇报说:“我们河南是个戏剧大省,比较有影响的就有豫剧、曲剧、越调三大剧种。”总书记知



道豫剧,知道常香玉,却不知道越调。王明义就给总书记汇报说:“越调戏很好听,越调的代表人物申凤梅善演诸葛亮,被称为活诸葛。毛主席、周总理都看过她的戏,周总理还夸奖申凤梅说,“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是她的《收姜维》演得特别好,其中的不少唱段,河南男女老少都会唱。

王明义还给总书记说,申凤梅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还是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前两年过世了。江总书记不无遗憾地说:“啊……那可听不成她的戏了。”王明义接着汇报说,她有个徒弟叫申小梅,也是唱诸葛亮的,唱得和申凤梅一样好。如果不看人只听唱,根本就与申凤梅没啥区别。

7月12日晚,申小梅和河南的其他几位艺术家一起在郑州黄河迎宾馆给江总书记唱戏,申小梅唱的还是申派名剧《收姜维》。观看演出后,江总书记和温家宝、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兴地上台接见演员。当总书记接见到申小梅时说:“你是……”申小梅忙回答:“我叫申小梅……”总书记说:“知道,知道,演唱得很好。”

2007年,申小梅被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会议期间李长春、李克强、乔华建等在代表团驻地观看了申小梅、黄宏、郭达、李双江等同台文艺联欢晚会的演出。李克强到河南代表团驻地看望河南代表时,申小梅握着李克强的手说:“李书记,我是申小梅。”李克强高兴地说:“谁不认识你呀,名人,诸葛亮!”李长春在看了《收姜维》后给申小梅说:“一听你的《收姜维》就想起了你的老师申凤梅。河南越调很好听,很大气……”又说:“小梅这个徒弟,要不看脸,唱的就跟你老师申凤梅一样,现在你老师不在了,你可是任重道远哪!”



毛主席批示的灾情调查

王汉斌口述 李四端执笔

我是郸城县宁平镇芦庙村人，中共党员。1947年11月参加工作。1951年参军，在部队荣立一等功三次。1957年复员后，历任民兵队长、乡人武部部长、县农场副场长和副书记等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9年，应邀出席国庆10周年观礼。

1960年4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临出发前，时任宁平公社副书记的张廷山对我说：“汉斌哪，到北京去开会，要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咱公社的受灾情况啊，如实地反映……”我想：我不怕，就是杀头，也一定如实汇报家乡受灾情况。

4月15日，上午参观航空表演，午饭时每人发了两块面包，我没有吃，装在口袋里了，这事被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毕占云同志看到了。晚上，毕司令员到住室看望说：“汉斌哪，在机场发给的面包你咋不吃，装了起来。”我就答道：“家乡受灾没啥吃，这面包是留给母亲吃的。”毕司令员接着问：“你说说家乡的情况吧！”我接着说：“1959年秋天，天大旱受了灾，家家户户都没啥吃，光俺村子就饿死36人，牲口也饿死剩2头，树皮、草根都让吃光了……”说着说着我忍不住眼泪直流。毕司令员安慰一番，临走时说：“汉斌，你的提包借我使使。”

毕司令员决定让主席知道灾荒情况，于是连夜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过之后说：“你明天就去王汉斌家去看情况，是不是这么严重。”



毕司令员第二天天一亮就启程,来郸城宁平公社后,在时任公社副书记赵朝仁的陪同下先到了芦庙村我家,看望了我的母亲,打开带来的一提包礼品说:“大娘,这些面包你留着吃吧!汉斌停几天就回来了,你不用挂念。”毕司令员看到我的家人,饿得不能动,浑身浮肿,心里很难受。毕司令员落实了我提供的死亡人员名单,不是36人,而是饿死48人。接着又调查了徐楼、许楼村,情况非常严重。一行人回到宁平公社里,毕司令员说:“我们查看了一天一夜了,还没吃啥里,弄点吃的吧!”赵朝仁犯了愁,没啥可吃的怎么办?最后在饭店里找到周海清:“这是给县领导准备的一小锅拍饺子,就叫司令员吃吧!”每人一小碗,吃过后,就朝县里去了。

毕司令员回到北京,把调查的情况写了报告,向毛主席当面做了汇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边的工作很难办。”

5月3日,我从北京回到郸城,向时任县委书记的张明铎、县长寿新荣等做了汇报。县里连夜召开电话会议,参加人员为各公社书记、社长、粮食局长、粮管所主任等。传达了会议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开仓放粮,第一周每人每天1斤2两,一周后每人每天1斤半。仅宁平公社就放粮300多万斤。群众普遍说:“这救命粮是毛主席给的啊,没有毛主席我们就没命了!”



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乔慕东

张继华

1954年7月,在淮阳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乔慕东当选为县长。1956年12月在淮阳县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乔慕东被选为淮阳县第一届县政协委员会主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乔慕东以淮阳县委第一书记身份参加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在这次七千人的大会上,乔慕东和西华县县委书记尚文安、县长单品正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我随豫剧三团和毛主席合影

高 洁

我是沈丘县人,从小学戏唱戏。50年代,进入河南省豫剧三团当演员。在全国闻名的河南名戏《朝阳沟》一剧中,因我多年饰演拴保娘,成了观众熟悉的“专业户”。1963年12月,《朝阳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朝阳沟》在全国就更响了。

拍完电影后,豫剧三团到东北巡回演出。在沈阳演出时,有一天领导突然给我说:“毛主席正在号召大演现代戏,常香玉院长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她想参加《朝阳沟》的演出,而且常院长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她只能演你这个角色——拴保娘,在北京一些重要场合,拴保娘由常院长来演,你思想上要有个准备,更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如果说没有想法完全从心里接受,那是假话。但当时心里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首先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天一到北京,我立即帮助常香玉排戏。不几天,三团的大队人马一到,立即开始合乐响排。

有一天,文化部通知豫剧三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朝阳沟》。这消息让三团所有人都倍感兴奋,尽管我曾多次为中央领导演出,但还不曾到中南海演出,而且我意识到,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可能是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怀仁堂的演出栓保娘这一角色仍由常香玉饰演。就这样,我跟随《朝阳沟》剧组走进了中南海,作为一名幕后人员,为确保演出成功全力以赴。

正式演出前,常香玉点名要我为她化妆,我精心为她化好妆后,还在幕条旁放了一把椅子,让她下场后可直接坐到椅子上休息,而不必再到后台去。

1963年12月31日,《朝阳沟》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演,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都来了。演出结束后,他们还上台接见了豫剧三团的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毛主席他们走后,常香玉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极其兴奋地说:“小高啊小高,主席说我们的路子走对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接见豫剧三团的照片,至今这张照片还挂在豫剧三团的会议室里,不仅成了豫剧三团最为辉煌时期的见证,也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与毛主席的合影。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卢九荣合影留念

李 珍

卢九荣,沈丘县纸店镇卢寨村人,1941年4月生,高小毕业,共产党员。曾在空军三七五三部队服役,任上士班长。

卢久荣在1962年4月当工程兵挖山洞时,被一块大石头挤伤腰部,仍带伤坚持工作。后化脓住院抽去肋骨两根。出院后,仍坚持工作,从1961年至1965年,连续被评为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出席兰州军区空军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1964年10月5日,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战士代表会议,受到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握手合影。

1966年冬,卢九荣转到地方国营沈丘纸店机械厂工作。



难忘毛主席与我们合影

王少顺口述 冯长安执笔

1965年5月,周口镇剧团许团长写的《斗书场》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中南五省汇演。中南局书记陶铸等领导观看了参选节目后,决定河南选送的《斗书场》和湖南选送的《补锅》等一批优秀剧目进京汇报演出。

进京后,《斗书场》这批节目在解放军总参礼堂、政协礼堂进行了多场演出,并五进中南海汇报演出。《斗书场》的内容反映的是60年代在豫东农村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以大凤为代表的是说红书、唱新戏,而以钱快嘴为代表的是说旧书、宣传封建迷信。在两人对说斗唱的较量中,大凤的新书得到了广大听众的赞扬,而钱快嘴的听众都跑光了,最后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也会说新书,说一个雷锋本是一个兵,当兵的不是老百姓,他抗美援朝出了征……”逗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哈哈大笑。演出成功后,中宣部设宴热情款待了演职人员。

10月9日,我们在劳动部招待所开了一个会,省文化厅李处长到会讲话。他说:“明天中央负责同志要接见我们,今天谁也不准外出,并反复强调纪律:一是打火机、火柴、小刀等金属制品一律留下;二是中央领导不握手,我们不要主动伸手;三是仪表要端庄、着装要整洁。”那天我们兴奋了半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按顺序排队进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大厅里准备接见的座椅早已排列完毕,我们文艺界代表分上下六





一排叶剑英(左一)、罗瑞卿(左二)、康生(左三)、陆定一(左四)、董必武(左六)、朱德(左七)、毛泽东(左八)、周恩来(左九)、邓小平(左十)、彭真(左十一)、陈伯达(左十三)、贺龙(左十四)、徐向前(左十五)、二排高雪棠(右三)、申凤梅(右五)、三排本文作者王少顺(右一)

排,安排在大厅西侧,我轻声问旁边的人:“几点了?”他说:“可能9点了。”这时工作人员挥手说:“请大家安静!”突然熟悉的东方红音乐响起来啦!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在全体政治局委员们的簇拥下,健步走进了宴会大厅。顿时大厅的吊灯全部亮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总理的挥手示意下,大厅里又渐渐恢复了平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董必武、彭真、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陆定一、李富春、陶铸、杨尚昆、罗瑞卿等绕场一周与代表们频频招手致意,当毛主席走到我们身边时,周总理的双臂做了几个担挑的戏剧动作,主席愣了一下神,总理又做了一个《补锅》剧里拉风箱的动作,主席看明白后,朝我们笑了起来,摄影师安排大家开始照相。主席的椅子摆得朝前突出了点,当时用的是等距离旋转式拍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摄法,相机已经旋转开拍了,而主席仍在扭头和总理交谈。摄影师高声提醒“请主席坐好”。毛主席不慌不忙把头扭正,照相机也正好旋转到位开始曝光,我心里赞叹说,“艺术,真艺术”。

斗转星移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那幅与毛主席的合影时,就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心想:我一个平凡的文艺工作者,能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伟人一起合影留念,此乃人生一大幸事啊!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汪德全

李培武

汪德全(1930~2003),沈丘县槐店回族镇南关人,1959年参加沈丘搬运队,历任队长、工会主席、搬运站站长。1974年因抓民兵训练工作成绩突出,参加河南省民兵工作表先会,同年被评为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民兵工作表先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穆欣同几位国家领导人的交往

邢长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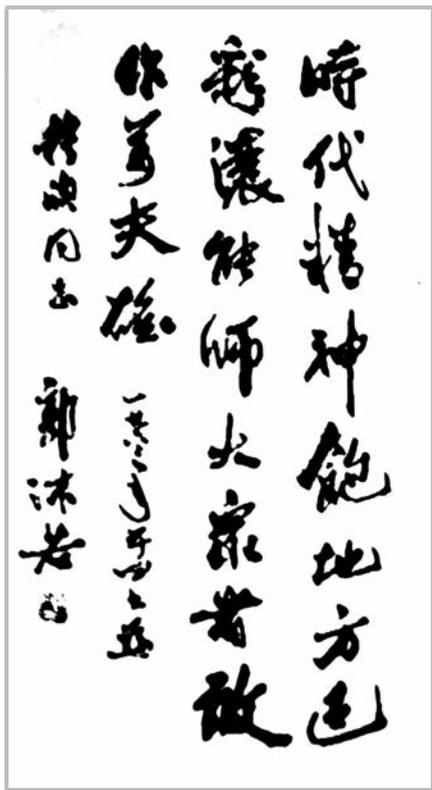
穆欣，扶沟县练寺人，1936年底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山西新军。1938年6月，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办《战斗三日报》，开始记者生涯。年底，参加了在长沙成立的中共领导的国际新闻社。1939年12月，穆欣到延安为国际新闻社撰稿，报道延安风貌和陕甘宁边区革命建设的成就。

1943年秋天，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韩钧从延安经晋绥去前线，周恩来特地嘱托他捎话给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

周恩来对新闻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使穆欣很受感动。

解放后，穆欣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63年春，人大副委员长郭



沫若为穆欣写诗相赠,称赞穆欣的文章风格“时代精神饱,地方色彩浓。”

全诗如下:

时代精神饱,地方色彩浓。
能师大众者,敢做万夫雄。

对于郭沫若的这幅墨宝,穆欣是珍爱有加,一直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穆欣到光明日报社工作不久,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提议换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为此,穆欣于1964年夏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因原先用的报头为郭沫若所书,毛主席没再给写。

1966年5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穆欣成为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并任办公室主任。

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表的穆欣一同出席大会。周恩来讲话结束后,即带领李先念、穆欣绕体育馆场地一周,接见参加大会的群众,群众代表给周恩来、李先念、穆欣三人献戴了红卫兵袖章。

当时,全国大报都是毛主席题写的报头,惟《光明日报》似有特别之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光明日报换用报头呼声日高。

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发表的郭沫若的《满江红》一词,引发了毛泽东的唱和。1月9日他在杭州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并把这首新词抄送多人。其中,有一纸在最后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这一注明是一气呵成,“光明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报”四字写得更是神采飞扬。1966年12月,穆欣就以收集到的毛主席这一手迹“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并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经同意,新报头于1967年元旦启用。



周总理与黄泛区农场

翟国胜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占领豫东重镇开封后,大举西进,威逼郑州、武汉,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进犯,采用“以水代兵”,在郑州北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淹没面积5.4万平方公里,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形成旷古未有灾难深重的黄泛区。从决口到1947年3月黄河堵口合龙,黄水整整泛滥了8年之久。

1949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河南代表许西莲(时任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崔玉华(时任豫皖苏行政公署农垦学校校长)等同志关于黄泛区复兴问题的大会发言后,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高度重视,决定组建黄泛区复兴委员会,由当时农业部办公厅主任张林池具体筹备。1950年2月,“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时的中央财经委主任、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主任,成员有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等。随后,李书城又亲赴黄泛区了解救灾情况。

1950年3月21日,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成立,局长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两个副局长是江苏的赵一鸣和河南的路岩岭。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3月27日,复兴局机关由开封搬到西华县城,下设机耕科、农业科、宣教科、财务科和医疗队。复兴局成立后主要抓了四件大事,一是协调当地政府,组成了几十万人的治河大军,先后疏通了黄水淤积的颍河、贾鲁河及双泊河,排除了内涝积水;二是开展防疫卫生工作,防疫治病170多万人次,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蔓延;三是帮助回乡农民垦荒40多万亩。

12月,赵一鸣、路岩岭受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复兴局局长吴芝圃委派,赴北京向复兴委员会汇报工作。黄泛区复兴委员会主任陈云向周总理电话报告,周总理指示会要在中南海开,五部部长全部到会,周总理亲自到会听取汇报。赵一鸣、路岩岭汇报了黄泛区复兴局一年来的工作,周总理听了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非常满意,说:“复兴局工作完成得很好。唯灾民房子没有建起来。按粮食收成,比许多县还要好些。地可以按户分给农民,三年不要粮。地多人少,农民种不完,黄泛区可以建个大农场嘛。”大家齐声同意。于是经过紧张筹备,1951年1月1日,在原复兴局的基础上,黄泛区农场正式建立,原复兴局副局长路岩岭任第一任场长。



周总理心系沙河决口

傅格锋

1953年8月4日凌晨4时，沙河在商水县张明柴湾堤段决口。洪水自西向东南长70公里、宽19公里，平地水深2米多。全县15个区1779个自然村受灾。七区张明2万多间民房被淹塌，柴湾村800多间草房只剩下三间没倒，其余全被洪水冲走。几万亩丰收有望的秋禾被洪水冲毁，5人被洪水夺去生命。

8月4日16时许，商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值班员急忙拿起电话问：“哪里？”

对方答：“我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

值班员问：“你找谁？”对方答：“我找商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值班员放下听筒，立即去找县政府秘书温子端。出了办公室门口看到温子端，值班人员就喊道：“温秘书，中央来电话了，要县长哩，快去找呀！”只见温秘书快步赶到宋淮风代县长的办公室报告说：“宋县长，中央来电话了，要你去接。”

宋淮风快步走到县政府办公室拿起听筒问：“哪里？”“是北京。”“你是谁？”

“政务院的周恩来。你是谁？”

宋淮风迟疑片刻，不敢相信是总理的电话，但也不敢重问，只好如实报告：“我是商水县人民政府负责人宋淮风。”

“我请你把商水县沙河柴湾决口的原因、淹了多少地、损失多少财物、淹死多少人和抢险救灾措施做一汇报。”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宋淮风略做准备说：“今日凌晨4时，沙河在商水西部柴湾决口。商水县被淹土地100多万亩，塌房3万间，损失粮食约5000万公斤，受灾群众达30多万人。县委、县政府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成立了抢险指挥部，一面抢救人畜财产，一面集中物力人力，抢险堵口……”

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要求宋县长要随时通报受灾情况，并要想方设法减少灾害给群众带来的损失，帮助解决灾民面临的困难，以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电话后，宋县长及时向全县干部群众报告了周总理电话询问沙河柴湾决口情况和指示要求，以增强商水县委、县政府、全县人民抗洪抢险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各级领导对商水沙河柴湾决口给予了重视和关怀，诸县市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大批食品和衣物运送到灾区，及时解决了灾民的生活困难。

8月11日，省、地组织西华县及本县民工7000多人，从漯河、周口调来架子车700多辆开始修堤堵口。历经22个昼夜，完成了修堤堵口108米。而后，相继给七区拨发大批救灾粮款。很快，灾区恢复了生产，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敬爱的周总理询问灾情的事仍铭记在商水人民心中。



周总理为我授枪

杨聚才口述 陈临光整理

1936年,我出生在扶沟县崔桥镇一个贫苦农家,原名孙玉才。1938年夏,随父母逃荒来到商水县邓城镇杨湾村,父母靠给人家帮工维持生计。6岁时,商水县遭到干旱、蝗虫危害,庄稼歉收,父母因饥饿相继死去,我被杨勇志老人收为养子,改名杨聚才。

高小毕业后的1952年春天,我动员全家率先加入了杨湾农业初级社,我被编入基干民兵连。在生产互助、抗洪抢险、排涝救灾、沙河固坝复堤、民兵集训等各项工作中,我不怕苦,不怕累,冲锋在前。1958年全县民兵集训比武,我投弹、射击、跨壕、排障等项课目成绩优异,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被评为省、县劳动模范、民兵英模。

1960年4月24日,全国民兵英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以全省民兵模范、军事标兵的身份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受到



杨聚才同志在参加全国民兵模范会议时留影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中央军委的嘉奖，国务院总理兼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俺颁奖，授予“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子弹百余发（此枪于1986年9月收回封存在县人武部），并勉励我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鲜明的阶级立场，苦练过硬军事本领，随时做好保卫党、保卫国家的准备。

当我站在领奖台前接受周总理授枪的一瞬间，浑身热血沸腾，激动得心情无以言表。回家后，我时刻牢记周总理教诲，工作更加努力。我还为全公社群众和中小学师生做报告，讲关于当前的形势、任务和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

1966年9月，我又以全国民兵模范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了建国十七周年国庆观礼，再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所有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的请柬

窦忠兰

1941年,我生于沈丘县。1958年参加教育工作,历任小学教师、主任、副校长。

在工作中,我总结的“十步备课法”、“环境教学法”和“阅读教学法”作为教学成果,曾在书刊上报道推广。

1960年6月1日至11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会议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有2686人,我还记得河南省有李准、马琳、毛爱莲。

6月1日,吃过早餐,我们河南省代表团离开西苑宾馆住地,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刚刚落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是能容纳5000人的宴会厅,南端是全国人大办公楼,群英会就在中间的万人大礼堂举行,我的座位在二楼。

大会开幕时,正值周恩来总理访问蒙古归来。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休息,就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董必武、副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了大会。当面带微笑的中央首长健步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会上宣读了当时在南方视察的毛主席发的贺电,当听到“祝大会成功,后会有期”的简洁贺词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做了长篇报告。

6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向代表们做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了国际形势的报告。他是随周总理刚结束了对越南、印度、蒙古等六国的访问。他身着中山装,戴着墨镜,没有讲稿,满口四川方言,潇洒自如地讲述着访问的过程和细节。陈副总理讲话十分风趣幽默,会场里不时响起掌声和笑声。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代表们听得十分专注,津津有味,报告结束了,大家还意犹未尽。

在大会上,我还接到了周总理的请柬。请柬是红色单页便笺,内容是:“定于一九六零年六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招待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敬请窦忠兰同志光临。”落款是手书签名——周恩来。

7时未到,代表们已齐集宴会厅,等候领导的到来。当周总理和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陈毅、陆定一、徐特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入宴会厅时,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他盛赞大会代表是“文教战线上的各路英雄”,“在过去的工作斗争中发挥了尖兵作用”。他强调指出:“文化教育工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号召文教工作者“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他还语重心长地勉励代表“要戒骄戒躁,继续前进,更好地发挥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做教学改革和文化技术革命的促进派”。周总理的讲话激起了代表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席间,周总理高举酒杯,带领与会的中央首长向我们走来时,大家都站了起来,我激动得心跳加快,不知所措。总理等中央首长向我们敬酒碰杯时,虽然我从未喝过酒,还是高兴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是我今生喝的第一杯酒。周总理容光焕发,和蔼可亲,我们都依依不舍地目送领导到其他代表团去敬酒。宴会同时,台上还有文艺节目演出。已经七十多岁的朱德委员长步履矫健、兴致勃勃地登台祝酒,并一饮而尽。整个宴会洋溢着欢快祥和的气氛。



6月11日,大会闭幕时,通过了“向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电”。林枫向代表发了奖。中央委员、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致闭幕词。每个代表收到了四份奖品:奖章一枚、1—3卷《毛泽东选集》一套(第四卷出版后又补寄给我们)。特制“英雄100号”金笔一支、印有“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字样的纪念册一本。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本纪念册和大会出席证,其他几件都在多次搬迁中遗失了。

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的接见和宴请,一直鼓舞着我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从教四十年,先后获得过省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先后获一百多次荣誉并被评为特级教师。



霍守彬与周总理合影

李 郁

霍守彬，西华县李大庄乡二台村人，1934年出生。1956年参军到北京8341部队服役，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建党节那天，周恩来、李先念、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8341部队13支队警卫人员，并合影留念。霍守彬当时是该支队司务长。这张照片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后院周总理办公室门前拍摄。

霍守彬在部队曾立功受奖，后来把这张照片和立功喜报夹在玻璃镜框里精心保存，以至今天喜报和照片已无法揭开。霍守彬1972年从部队复员后，多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1961年7月1日建党节，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8341部队十三支队警卫人员，霍守彬在合影照里的位置，从上往下数，三排左二。



理锐与周总理在布加勒斯特

李 郁

理锐，西华县城人，十几岁即参加革命。丈夫于明是一名新四军资深记者，解放后到新华社工作。1964年，于明奉命到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任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理锐奉命随行协助工作。

60年代初期，中罗友好关系发展较快，周恩来总理曾在1965年、1966年两年内三次访问罗马尼亚，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会晤，理锐夫妇一直陪同周总理进行访问并全程负责相关报道。

1965年，理锐和丈夫于明从一系列迹象中发现当时的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党主席乔治乌·德治已经病入膏肓。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健康不仅和死亡相系，有时也和这个国家的外交走向相联，更和其他国家与该国的调整外交关系相关。于是于明夫妇对他的健康问题高度关注。在一次乔治乌·德治极短暂的会见一位美国贵宾的活动中，理锐和于明已判断出他即将不久于人世，果断地向国内发回一篇详尽的内参，这样的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果然，这份内参引起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当时他正在考虑我国如何在东欧加强影响的战略问题。没过多久，乔治乌·德治逝世了，我国立即派出已有充分准备的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葬礼。治丧期间，周总理以他的笑容和睿智与新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了两国邦交的主动权。

周总理在罗期间，对分社工作给以高度评价，并特意表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新华社分社的全体同志,他对理锐夫妇说:“多亏你们及时发回内参,这次参加罗首脑的葬礼我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效果才这么理想。你们不愧是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有经验有胆识的好同志!”

周总理回国前,曾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亲切会见全体工作人员及中国留学生,那些年轻学生一见总理,呼啦啦围上去兴奋得忘乎所以,有人竟使劲拉着总理的右臂一个劲地上下摇动,理锐知道总理右臂有旧伤,赶紧上前给总理解围,可是周总理并不怪罪那些孩子。

由于那次访问取得空前胜利,总理和大家都非常开心,合影时每个人都喜笑颜开。合影后,大家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周总理突然对蹲在他前面照相的理锐说:“大家都和我照过相了,只有那位灯光师还没与我合影,你去叫他过来和我合个影。”

理锐赶紧去叫灯光师,灯光师一听简直惊呆了,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理锐就拉着他与总理合了影。周总理又特意嘱咐理锐“洗出照片后,要亲手交给这位同志!”后来,当理锐把照片交到那位灯光师手中并告诉他这是总理嘱托时,那个同志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于明还向理锐讲了周总理认真帮他改稿的事。中央领导到罗马尼亚,都要发新闻稿,而这些稿子多是于明写成的。有一次,于明写好总理与罗马尼亚新任总统会谈的稿件后,拿给总理审阅,总理看后点了头。于明拿着第二天要见报的急需传给总社的稿件走了,总理随后想起应加一句话,就去追于明,刚好于明如厕了,周总理追过去,两人把稿件又修改了一遍。

总理与分社工作人员合影时,请总理站在中间,总理坚持要理锐在中间,总理说“理锐同志,新闻工作者不要这样吗,很多新华社记者都知道,和他们合影时我从来不坐中间。今天让你在中间,也体现对女同志的尊重吗!”理锐只得依总理之意,站在中间





后排右二为周总理,左二为谢富治副总理,中间为理锐,右一为于明,左一为新华社记者张汉文。

和总理合了影,这张照片理锐多年一直珍藏在身边。

第二年春天周总理再次访问罗马尼亚,已经与理锐夫妇稔熟了。理锐以多年革命工作锻炼出的成熟稳健及热情,在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大方得体。在大使馆里宴会上,理锐知道总理酒量大,爱喝茅台,一杯杯向总理敬酒;周总理也知道理锐好酒量,也一杯杯回敬她,全体人员都喝得特别愉快。理锐曾这样评价周总理饮酒:“李白是古代第一酒仙,总理是当代第一酒圣。”后来从罗马尼亚大使馆回来的人说:“在罗马,总理常和理锐夫妇说说笑笑,显得特别开心,我们羡慕得要命……”

下面这张照片是1966年春天总理第二次访罗马尼亚时与中国驻罗工作人员的合影。紧挨总理左边是理锐,总理右边的是机要秘书,前排左一戴眼镜的是代表团副团长乔冠华,右一是于明,他刚给大家拍过几张合影,赶紧跑过去站在旁边让另一位记者照了这一张。





周总理第二次访问罗马尼亚,谈判开局进展不顺。他曾给理锐夫妇讲了这样一件事:总理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达不成协议,我回国一下飞机就会被批斗”。是这句话使齐奥塞斯库转变了态度,会谈开始有实质性进展。对于周总理的那句“我回国一下飞机就会被批斗”,理锐夫妇实在想也想不通,理解也理解不了。1964年出国前,国内形势不错啊,工农业生产都在恢复中,国家总理怎么能和“被批斗”连上啊。他们不便多问,但又为之困惑。不久,总社让理锐夫妇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夫妇回到北京时,正是8.18红卫兵刚刚接受了毛泽东检阅,全国开始大乱,他们才对总理那句话有所理解了。

周恩来邓小平接见袁家骝

李 郁

袁家骝,项城人,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子,世界著名物理学家。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学系,1934年获硕士学位。1936年赴美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研读,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2年起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所工作,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研究员、布鲁克黑文国立实验室物理研究员。二战期间,曾研制成功用于国防军事设施的连波雷达,使飞机飞行速度、高度以及飞机间的距离可以自动控制。二战结束后,用于民航,大大提高了飞行安全系数。他的《高能物理加速器研究》一书是高能物理学界的权威专著,为高能物理研究者所必读。

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长期在海外,一直牢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第一次回国前,与中国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黄华进行了长谈。当黄华问他们回国有没有什么要求时,袁家骝说想去彰德袁林去看看(即安阳袁世凯的墓地)。要求



去的其他地方都准了，可就这个地方黄华没说准也没说不准。1973年10月15日，夫妻回国后先到北京，百忙中的周总理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接见并宴请了袁家骝夫妇。周总理握着袁家骝的手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谈话中，周总理特别提到：“你们不是想去安阳看看吗，那你们就去吧！”

北京之行，最让吴健雄和袁家骝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他们，吃饭谈话，一直延续了6个小时。当时在座的有郭沫若、吴有训、钱学森等。刚见面时总理就风趣地说：“吴教授是江苏人，袁教授是河南人，安徽在江苏、河南之间，所以我就在安徽厅接待你们。”总理的细心安排，让他们感到非常温暖。

离开北京，他们来到了安阳，这里不仅是袁世凯葬身之地，也是袁家骝出生之地，他在这里过完了人生的童年，直到13岁才离开。夫妇到袁林拜谒了爷爷的陵寝。又过了几年，在河南省长何竹康的陪同下，他们再一次去了袁林。

1977年，袁家骝和吴剑雄回到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向他们介绍了大好形势和国家发展的美好前景。



邓小平接见袁家骝夫妇



陈毅和张伯驹

李 郁

张伯驹曾说：“共产党里有我们两个知心朋友，一个是宋振庭，一个是陈老总（张伯驹对陈毅的尊称）。”

张伯驹和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往来最早的是陈毅。

全国解放之初，张伯驹与潘素前往苏州扫墓时，有朋友邀请她到上海住了几日。一天，旧友丰子恺、魏金枝等邀他们一同出席上海文化界的一个聚会。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的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两人不免要谈戏剧诗词。听说柳亚子和陈仲弘相识，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找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词集转呈仲弘先生。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没有什么。张伯驹所以对仲弘有兴趣，那是他看了仲弘的诗作，有几首写得很壮美，他几乎可以背诵，可谓是心仪已久了。

“死后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每一句都写得淋漓酣畅，恣肆痛快。感到这种气势不仅正是自己词中所缺少的，更是对自己那种遁世迟暮之感的冲击和警醒。

后来，有人告诉张伯驹，仲弘就是陈毅（陈毅，字仲弘），抗战时的新四军军长，此时正任上海市长。张伯驹有些愕然，后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人家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会理乎你一个民国遗老吗？”

想不到的是，陈毅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哪几首词他尤为喜欢。显然陈毅已把那本词集看过了。信中还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给张伯驹寄来他的近作。

1954年,陈毅调中央工作,全家来到北京。

1957年初,张伯驹和几位名家在北海举办《明清书画展》,陈毅元帅拨冗亲临,他为张伯驹的收藏感到惊喜,称赞说:“先生为保护国家文物之举令人敬佩,带头献给国家,能唤起民族的自豪感。先生诗词亦有北宋风度啊。”为此,陈老总还把张伯驹请到家中,畅谈诗词和书法,并以围棋相娱。

画展过后没多少天,张伯驹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为这事,他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接着是饱受打击歧视,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是极难,他又不愿再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的时间,一拖就是四年……

1961年,张伯驹和妻子潘素应邀去长春从事教学和文物管理工作,临行前写信向陈老总辞行,怎么也没想到,几天后陈老总派车接他们至家中一叙。车到门前,陈老总和夫人张茜门外迎候,并设家宴为他们夫妇饯行。

他和陈毅先从写诗填词谈起。陈毅称赞张的诗作很有北宋风度,精彩可观,不可多得,说:“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毛主席的词,博大宏远,气势磅礴,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音韵铿锵,字字功夫。”

当张伯驹把被打成右派和去吉林工作一并告诉了陈老总后,他问张:“你被列入右派的事,事前为啥不向我说?”张说:“事先我未想到,不过受教育也是好的。”

陈老总还问在生活、作画诸方面有什么困难,也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张伯驹说自己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老总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张不无伤感地说:“此事大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



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老总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捐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一席话,使张伯驹不知道再说啥好了。

“这次你们去吉林,我要写信给吉林省委,对你们加以照顾。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是1962年在长春工作的时候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并不知道为他摘掉右派帽说话的人正是陈老总。虽说摘掉右派帽子,新的名称“摘帽右派”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但毕竟还是比不摘要好一些,尤其是从精神上也是一次解放。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考察,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吉林的宣传部部长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9月,张伯驹北京的住宅被红卫兵抄家,就给陈老总写过一封信,言及被抄后已是家徒四壁,将来如何维持生活,到时还须请陈老总帮忙相助等等;1967年6月,他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于本年1月被撤职,又患了高血压病的情况,并询问陈老总:政府有无规定,可准予被撤职的人停薪回家养病?这封信没有得到陈毅的回复。那时,正是所谓老师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事件发生不久,陈老总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张伯驹听到一个更坏的消息,陈老总也成了走资派,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气愤之中填了一阕《金缕曲》,其中有一句“池鱼殃及城门火,更娥媧(吕后乳名)牝雉钟室,居心测叵。”这首词竟被造反派发现,说语中的吕后是影射无产阶级的文艺旗手江青同志,而攻击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张伯驹的“历史反革命”还没结束,又被抓了现行,成了“现行反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向陈老总写信,一诉衷情,但却得知了他的境况竟是每况愈下,开国将帅一个个失去了自由。于是把写信倾诉变为自解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自励和自我安慰：“公功在国家，尚且被辱，我何足道哉！所指我之罪名，皆是莫须有之事，只可一笑置之！”

1970年，吉林省革委会按退职把张伯驹夫妇安排到农村劳动，但当地却以不合政策，拒绝接收已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无可奈何，1971年底，他们回到了离别十年的北京。

可是，回来才四天，便有人找上门来质问：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你们有户口么？有没有证明？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张伯驹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质问，只说了一句：“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几十年了！”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再次致信陈老总：

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〇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



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 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老总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怎忍心再打扰陈老总呢?

1972年1月6日,陈老总去世了。张伯驹挥泪写下了悼念陈毅的挽联: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
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折尊俎,浩气犹存,无愧于人民,有功于天下,九泉
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张伯驹所撰写的挽联情之真切,可谓沉哀入骨,而又不乏慷慨悲壮之气,其雄桀激昂的笔力直透纸背,令人顿生振奋豪迈情感。

其后,为纪念陈毅,又由夫人潘素画青绿山水《海思图》,张伯驹题悼诗两首于画上:

(一)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二)

怕听雍门曲,西州事可悲。
霜筠怜故箭,露薤泣灵旗。
国续褒忠魂,人寻堕泪碑。
音容图画里,剩寄海天思。



陈毅与西华扫盲

刘怀亮

1956年，西华县派扫盲办公室的许明德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学习苏联扫盲经验和全国工农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紧紧依靠群众和教师，根据汉字规律和成人学习特点，深入钻研、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地创编了《西华县速成识字教材和教法》。这一教学科研成果，为多快好省扫除文盲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省教育厅召开的识字教学座谈会上得到充分的肯定，会后在全省推广。

1957年，健全了县、乡各级扫除文盲协会和办公室。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以农业社建校，社长任校长，以生产队建班，队长任班长，以生产小组编为学习小组，生产组长为学习组长，教师就地选配。利用生产空闲，田间地头，开会前后，广泛开展了班级教学，包教保学、互教互学，“万人教、全民学”的运动。村院、路边、生产工地，到处是识字“课堂”。上自80岁的老太婆，下至未入学的儿童，大



陈毅题“西华扫盲”



都加入这一学习热潮。声势之大、范围之广,空前未有。学员“走着看、站着念、坐下写的成大片”,“白天划地皮、晚上划肚皮”,勤学苦练,蔚然成风。运用《西华速成识字教材教法》扫盲的巨大成果,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的认可,他为此书题写了“西华扫盲”四个字。《西华速成识字教材教法》于1958年6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推行全国,并在1962年为庆祝国际扫盲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9种文字印发世界各国。



郭沫若为沈丘两所学校题校名

郭成云

1954年沈丘一中建校后,校长赵醒民请王梓敬题写校名,王梓敬托王立芳写,王立芳怕写得不好,故以个人名义给郭沫若写信求字,信发到北京郭沫若工作办公室,回信说心情理解,但这种情况需用公函联系。王即和校长汇报情况,逐以公函形式写给郭沫若,很快郭老回信题写了校名。王立芳老师收到题词后喜不自胜,因当时有事即把郭老题词暂时交给了老伴,老伴竟交给了孩



74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子,孩子无知,把题词撕成了碎片,王老师知道后十分着急。王老师再向郭老写信说了假话,也是一生中唯一的假话,说写的题词被大水淹没损坏了,请郭老重写。不久,郭老重写了“河南省沈丘第一高级中学”。郭老不仅写了校名,还写了小牌,全校师生为之感动。师生们奔走相告,称赞郭老是多个人物,为国家事业操劳,日理万机,在百忙之中为沈丘题写校名,反映了郭老板端热情的工作态度和平易近人的精神风貌。他的高尚情怀在师生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题写的“河南省沈丘第一高级中学”的墨迹成了学校同学习临的墨宝。郭老的书法,底蕴丰厚,秀丽劲健,洒脱飘逸,让后生久学不厌。

1963年沈丘纸店初中成立,教导主任刘振林也试着写了一封信给郭沫若,不久便收到了回信,题写了“沈丘纸店初中”。当时“初”字写得可能不理想,郭老把此字划去,在旁边又重写了“初”字。50多年来,郭老的题词激励着沈丘纸店初中、沈丘一高及全县学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郭沫若为理琪烈士题诗

李 郁

理琪,1908年出生于太康县大许寨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游建铎,为表明和自己的家庭决裂而改姓理。他与彭雪枫、杨靖宇、吉鸿昌一起被人们誉为河南省四大抗日民族英雄。

1924年,理琪16岁离家到开封读书。他积极追求革命真理,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理琪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太康县开展革命活动;6月,理琪在游庄村开办了农民讲习所,宣传马列主义,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

这年的9月,理琪奉党的指示,到冯玉祥部无线电学校学习,后任冯部报务员。他利用职务之便,发动士兵支持革命。1929年,理琪随国民党部队开驻江西,因搜集军事情报被敌人发现,离开国民党军队到了苏区瑞金。1934年,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36年1月,理琪又奉命从上海赴山东文登县,重建被敌人破坏的中共组织。4月,隶属于山东省委的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成立,理琪任书记,当年秋,特委迁移到烟台市内。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理琪任书记。12月,由于叛徒出卖,理琪被捕后解往济南,任凭敌人如何拷打、逼问,他英勇不屈,坚守党的机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理琪于11月被保释出狱。

理琪回到胶东,马上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组建抗日武装,特



委健全了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理琪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12月24日，理琪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从此，胶东有了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2月初，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理琪率“三军”在文登、牟平两县，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2月12日拂晓，理琪指挥部队，里应外合一举收复牟平县城，并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伪县长。当天下午，部队撤出，理琪带领20余人，在山上雷神庙停下进行休整，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午后，被从烟台赶来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理琪迅速组织战斗，镇定指挥，并高喊：“同志们，坚守庙门，沉着迎敌，准备突围！”他们同比自己多十几倍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理琪指挥神枪手，把冲上来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倒。

下午3点，日军向雷神庙发起总攻，理琪壮烈牺牲，时年30岁。

1945年11月，理琪的遗体迁葬栖霞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内，并为其雕塑遗像供后人瞻仰。理琪同志的革命事迹被编入《胶东人民子弟兵》一书。

196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文登县天福山视察时，到烈士陵园凭吊，并为理琪写下了悼诗：

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
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
万代东风吹海隅，一方化雨仰宗师。
文登多少佳儿女，接力还须步伐齐。

这首诗生动地概括了理琪光辉战斗的一生。



终生难忘的接见

苗新民口述 郭成云整理

我是沈丘县白集镇苗营村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7年我任沈丘县总工会副主席兼县百货公司工会主席,那年9月,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工会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选为全国工会工作积极分子代表。

9月15日,全省42个代表集中到省会郑州,省委领导亲自接见并组织两天学习和动员;17日从郑州乘火车进京,住前门饭店。18日大会开幕,会议共开了5天。党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致词,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做了工会工作报告。会议的第三天下午,也就是9月20日,全体代表乘大客车从中南海西门驶入,到怀仁堂下车,逐人进行安全检查后,集中到怀仁堂后花园列队等待。大约3点多钟,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一入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党和国家领导人绕场一周,同前一、二排的代表握手。然后,坐在最前排与全体代表合影。接见后的第二天,对出席全国工会工作先进代表进行了表彰,颁发了奖状、奖章和奖品——全国英雄典型事迹材料,记得有“无脚拖拉机手”、“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等几本硬皮书。

能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感到非常荣幸,也使我终生难忘。



难忘的接见和宴请

张喜英口述 张均义整理

我叫张喜英,沈丘县石槽集乡龚寨人。1939年8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后我读完了小学。

1956年4月,经区委区政府领导推荐,我到县邮电局任室内话务员——看总机接电话。进局后我即按照领导安排和要求,认真学习邮电通信规章制度和邮电知识,按照“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苦练过硬本领。

我除练好一手接插电话迅速准确的基本工,还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深入钻研专业技术,创造出在磁石交换机上“手下持双塞,合理选线;正确识别信号,迅速接转电话”的先进操作方法,把平均应答时限控制在1.3秒以内。并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熟练地双手持塞,交叉作业,快速应答,灵活监听,及时拆线。这种操作方法和技术,曾在全省邮电部门推广应用,并在《河南日报》等报刊上作专题报道。

我不仅熟练地操作与市话工作关系密切的长话接续和电报收发,而且还向机线人员学习修话机、查线路、上电杆等高难技术,有时间还帮邮政人员出售邮票、分发信件、收订投递报刊、搬运包裹邮件等等。

1957年,我被评为省、专区邮电部门先进生产者,1958年,我被评为省、专区邮电部门标兵和沈丘县劳动模范、妇女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受到上级局和县委、县人委表彰。1959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周口

年,我被评为省、专区邮电部门先进生产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和河南省劳动模范。

1959年10月,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会议期间,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同时,还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专为与会者举行的盛大宴会。席间,周总理谈笑风生,我坐在距周总理不远处,聆听他对大家的祝贺、问候。并且,还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等亲切握手。会议结束后,我又受河南省委、省人委领导组织安排,到全省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详细介绍大会盛况并汇报个人的工作情况。

直到11月下旬,我才回到沈丘。

11月28日,沈丘县委、县人委领导和县直机关1000多人在人民剧院举行欢迎大会,欢迎我和槐店镇税务所主任郭恩普出席全国“群英会”载誉归来。会上,对我们二人进行了表彰,并号召全县各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向我们学习。翌年7、8月份,我又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先进模范人物考察团,在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率领下,到苏联、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观学习。

此后,我于1960年3月升任沈丘县邮电局副局长,1981年3月调周口地区邮电局工作,直到退休。

